

● 书 评

野火春风话崛起

——评吴代芳教授著《〈世说〉新探》

吴 志 达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志达(1931-), 男, 浙江东阳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和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 207.41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777-03

当我读着代芳的力作《〈世说〉新探》时, 不禁浮想联翩, 他那朴实、坦诚、坚毅、热情的品格、以及勤奋自励、严谨踏实而勇于创新开拓的治学精神, 恍然又展现在眼前。我们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武汉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的同窗挚友, 同受业于先师程千帆教授门下。代芳是“老武大”, 因本科学习成绩优异, 遴选为研究生的, 我和郝延霖则是慕程先生之名, 在北师大本科临毕业前考取武大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初到武大, 人地生疏, 与代芳住在同一个房间, 受到他热情的关照。他陪同我们去拜见导师, 还陪我们参观好似布达拉宫的图书馆、湖光山色美丽宜人的校园。我们感激这位热心的学长。

在朝夕相处中, 使我感受到代芳的专业根柢非常扎实, 思维敏捷, 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对某些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观点, 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 且具充分的论据。他极其勤奋, 每天晚上没有 12 点钟之前就寝的。因而, 他很快就出成果, 1957 年春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杜甫诗的长篇文章, 颇具影响力, 在研究生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就是从中受到激励, 把一篇论王安石诗的文章投寄《文史哲》的。当然, 我们之所以能够较快出成果, 与导师程千帆先生的教诲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按当时的势头顺利地发展下去, 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奋斗, 在学术上应当能够攀登到相当的高度。

遗憾的是, 那场“扩大化”运动的灾难降临了, 我们都未能幸免, 而由此引起的坎坷历程, 代芳比我更为艰辛。确实做梦也想不到, 出于共青团员的责任感, 响应党的号召, 帮助党整风, 居然会获“罪”遭严谴。往事不堪回首, 时过境迁, 无须赘叙。惋惜的是, 整整 20 年, 最富于创造力的美好年华, 是在无休无止的运动中虚度的。

人生处于困境之中, 可能有两种态度: 一是悲观失望地消沉下去, 一是在顽强奋斗中崛起, 代芳显然选择了后者。在那报国无门的年代, 知识分子很难以自己之所长报效祖国, 能够生存下来都需要坚强的毅力。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 “扩大化”的错误也得到纠正, 代芳的政治名誉得到恢复, 从偏远山区的一座中学调到郴州师专任教, 得以小试其才, 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点。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还很困难, 却奇迹般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陆续发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唐诗的系列论文或专著, 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一次学术会议上, 他对某位名教授的观点提出质疑, 雄辩的论述, 博得与会同行专家的赞叹: “小庙里也有大菩萨!” 千帆师读到他的专著《唐绝句艺术谈》, 高兴极了, 认为“殊有意味, 读之患易尽也。”读学术著作有这种审美效应, 足见佳作水平之高。白居易诗的名句云: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从代芳在困境中崛起, 更感受到诗句的深永内涵。

历来研究《世说新语》者不乏其人, 《世说》学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学术研究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 有所开拓, 有所前进。代芳著作的意义, 就在于《世说》学研究领域中,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 作出某些新的论断, 纠正了前人的某些偏颇, 使人有焕然一新之感。史学工作者研究《世说》, 着眼于史学价值, 文学史工作者则往往从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这一角度去论述问题, 哲学工作者当然把它视为魏晋士人玄谈的活标本, 各取所需, 皆有所遗, 立论难免有所局限。代芳则从文史哲兼顾的全方位去研究《世说新语》, 避免了前人的某种片面性, 拓宽了

视野,故多所创获。

“新探”之可贵,就在于新。现择其最显著者,略陈所见。

(一)在“新探”的结构方面,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

著者打破通常专书研究的体例,不作流水式的平板叙述,例如专书编纂者的身世、时代背景、该书的性质、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及其影响,不作专章介绍,省却许多篇幅。著者采取重点深入而互相关联、前后呼应、独树一帜的方式,从重点的专题论述中,很自然地带出需要陈述已见的相关问题,像编纂者的身世、思想意识、时代背景等诸多问题,著者非但没有回避,而且在论辩过程中突出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只不过这些观点是在论述其他某一专题时顺带出来的,针对别人的不同观点而发,因而更具有论辩性、挑战性,这是一种以少胜多的绝妙方式。有所破,须有所立。破流水式的平板结构,立山峦式的立体结构,格外醒目。“新探”全书,分总论、《世说》与文史之关系、批判《世说》研究中的错误倾向等三编十一章,结构合理,独具匠心,新颖特异。

著者纵览《世说》全局,高屋建瓴,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从《世说》的思想和艺术、语言特色、个体意识的崛起和社会诸矛盾之演变、与文史的关系、关于有意为小说,乃至历史的曹操和艺术的曹操,都作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二)对《世说》内涵理解的深刻、纯熟,运用资料得心应手、精当自如、富于创意

在《总论》编的首章《试论〈世说新语〉的思想和艺术》,就抓住了《世说》思想内涵的实质:“它是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士族名流的群相,把他们的生活思想展现在读者面前。捧读是书,比读当时的史籍更能深入地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这一认识极为深刻。更为可贵的是,代芳善于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避免绝对化和片面性。他首先指出:“虽然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来描绘书中人物的清谈言行,但由于作者面对现实,毫不掩饰地提供了不少清谈的资料,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清谈误国的流弊。”这一论断,既切中肯綮,且具新意。对于《世说》所反映的魏晋上流社会清谈之风的弊端,虽然前人也曾有所指,但大多囿于《轻诋》“桓公入洛”、《言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等少数显例,代芳书中不仅指出清谈误国,而且从更深的层面揭示清谈风气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因他对《世说》的全部内容的掌握达到纯熟的程度,且理解深邃,别有会心,故举例能于丰赡中显其精当,所举《文学》、《赏誉》、《简傲》、《政事》、《轻诋》乃至注引文字,都很能说明问题,足见用功之深,分析之精,已度越前修。他还指出:“作者虽然带着士族阶级的偏见,对封建统治者作了一些美化,但并不是如某些文学史著作所说的那样,对封建统治者毫无批判,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和颓废堕落的精神面貌,即使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没有放过。”这一观点,非常精辟。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对《世说新语》这样的文化遗产,既不虚夸其成就,也不掩盖其贡献,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列举《贤媛》“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及《任诞》、《汰侈》诸篇典型事例,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令人心服其卓见。

这一创新特色,更加鲜明地表现在《个体意识的崛起和社会诸矛盾之演变》中。论述魏晋人物“力图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思想上的解放,体现了人性的觉醒”,在前人著作中亦曾有所涉及,但代芳所论,从引据史籍和《世说》中《品藻》、《言语》、《伤逝》、《鉴赏》诸篇相关条目中,突现了上述观点,显得充实、有力,比前人跨进一大步。他总是从多侧面观察问题,因而也更能体察事物的全貌。一方面指出:“自然与名教的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人性觉醒和礼教束缚的矛盾,反映了自我意识和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道德规范的矛盾。”同时也指出士人中既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者,又有“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的复杂情况;既正视《世说新语》“重纲常名教而轻自然通脱,先事后玄谈”的事实,又肯定它“在客观上保存了自然与名教之争的宝贵史料,反映了魏晋士人对思想解放与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他提供给读者的是完整的《世说新语》的本体,但他又不是纯客观的介绍,而是经过辩证的、深刻的分析,全面地认识研究的对象。他对阮籍、嵇康内心矛盾的剖析,就是极好的范例。关于魏晋士人“面对着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的矛盾”,“注意力于是集中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对死亡产生了无限的迷惘和悲痛”,揭示矛盾,得其要领,分析精当,力透纸背。论者往往强调个体意识崛起的积极意义,而忽视其消极作用,代芳则认为个体意识的崛起仍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在生死矛盾的问题上表现为消极的迷惘和悲痛;在进退出处的矛盾问题上表现为个人的享乐主义等等,这真是惊世骇俗的独到见解。该章最后一段总结性文字,言简意赅,语语中的,不能不叹服其以少总多驾驭文字的功力,此诚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三)表现出高度的审美水平,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生花妙笔鉴赏文学作品

学术著作容易出现枯燥呆板、四平八稳或雕琢字句、矫揉做作的弊病。代芳“新探”则显得灵动自如,具有天然妙趣。艺术分析,能发掘其精髓,并以简洁生动的笔调描述其特色,“善于在写景叙事中渗入浓厚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绝无冗长的抽象说教,而是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感情融化在描写的具体情节和场景之中”。他以《言语》“司马太傅斋中夜坐”“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为例,赏析其“情景交融,读起来整齐和谐,音调铿锵……富于神韵,耐人寻味”的艺术特色

